

在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

4·914

56

在紅軍長征經過的地方

四川民族出版社

在紅軍長征經過的地方

(漢文版)

*

四川民族出版社編輯出版

成都人民中路

四川省新華書店發行 四川民族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^{1/16}·印張13/8·字数28,000

1960年3月第一版 1960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000 定价：一角一分

统一书号：M10140·39

目 錄

在紅軍長征經過的地方.....	周祖佑 (1)
甘孜一村庄.....	遇 之 (3)
靜脫枷鎖以後.....	里 深 (8)
人民的新城——甘孜.....	戈 平 (14)
跑馬山紀行.....	戴聲沛 (20)
草地散歌.....	周 韋 (23)
高原新花——訪康藏高原上第一所民族師範.....	遇 之 (30)
飄登區長.....	周祖佑 (35)
編後記	

在紅軍長征經過的地方

周祖佑

在阿壩藏族自治州著名的雪山草地，中國工農紅軍曾經用血汗寫成了一頁永不磨滅的英雄業迹。也是在這個地方，他們使黨和藏族人民第一次建立起牢固的聯繫。藏族人民開始懂得，要走向繁榮和幸福，只有緊緊跟隨着共產黨。

卓克基的位置接近雪山、草地的交會處，是當年紅軍長征經過的地方。從這個普通藏族村寨的經歷，我們深切地感受到黨和藏族人民血肉相關的聯繫。過去的卓克基，是一個貧窮落后的藏民小寨子。今天，這裡却已經建立了人民公社。藏族人民自由歡樂地生活在春天的陽光里。

誰要是第一次來到這個梭磨河畔的村鎮，一定很難相信，几年前，這裡竟是一片荒涼。現在，這裡有了公社的百貨商店門市部、縫紉組、診療所、學校、公共食堂……，甚至還有一個美術攝影部。

我在公共食堂里吃了一頓午飯。有麥面菜饃和新鮮白菜湯，老實說，我真沒想到飯菜會這樣鮮美。我开玩笑地問鄉干部羅爾熱木初，解放前的伙食如何？這個給封建主當了二十多年奴隸的女青年囁嚅著，回答說：“頓頓苦蕎粑，連過年過節，也吃不到這樣的好東西！”

這裡的一切，都閃射著幸福的光彩。誰還能發現一點貧窮苦難的痕迹？

但是，卓克基的確有過充滿血淚的往昔。附近溝寨的一百七十多戶藏民，祖祖輩輩生活在封建主的殘酷統治下。交不尽

的租款，当不完的差役，有多少人飢寒交迫，有多少人家破人亡！1935年6月，毛主席领导着红军来到这里，藏民才第一次在生活中发现了光亮。在红军的帮助下，他们成立了鄉苏維埃、革命委員會，建立了自衛隊、少先隊等革命組織。很多人还積極地为红军担任通司（翻譯）和响导，帮助红军筹集粮食。他們第一次享受到人与人間平等的权利。五个多月后，红军繼續北上，最后一支红军，离开了这个地方。但是，革命种子却深深播下了。在那黑暗的年月里，藏民們万分珍惜地保存着红军遺下的銅鍋、小刀、帽子和銅幣。他們盼望红军回來，盼望着最后的解放。

这一天終于來到了。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这个苦难深重的地方。在毛主席曾經居住过的寨子里，建立起了区、鄉人民政府。經過1956年的民主改革，藏民們得到了徹底的解放。他們組織起互助組、农业社，1958年，又建立了人民公社。一百七十多戶藏民，从此永远走上了幸福繁荣的大道。1958年，这里粮食亩产达到三百三十斤，比解放前增加好几倍。解放前三分之二人家缺粮的村寨，如今再沒有人為吃飯發愁了。

五十六歲的朵西斯头，父、母都是封建主的奴隸。1935年，他从红军那里懂得了自己貧困的根源，決心永远跟着红军走。他到处向鄉親們宣傳，还積極地同红军一起劳动，帮助红军筹措粮食。但是，因为父母生病死亡，自己又染上重病，红军北上时，他留在了家鄉，重新当了封建主的奴隸，有多少夜晚，他憶念着与红军共同生活的日子，盼望着红军早日归来。当卓克基解放后，这位老人甚至还跑去要求，希望再参加解放军。現在，朵西斯头已經在公社里过着幸福的生活。最近，他和老伴一次就領得四十多元工資。朵西斯头指指身上的毡帽、灯芯絨衣服和牛皮藏靴，感慨地說：“解放前，我哪能穿上这

样的衣服呵！”他象是总结自己的全部经历似地对我说：“我活了五十多年，只有在党的领导下，才过着真正象人一样的生活。”

在这个地方，二十四年前红军播下的革命种子，已经发芽、成长、开花。我看到当年牺牲了的苏维埃干部和红军的子弟，现在接替了父兄的事业，勤奋辛劳地为藏族人民服务。有一个二十七岁的、名叫斯达特的青年，父亲1935年参加红军后，牺牲在长征的途中。母亲受尽折磨，死在封建主的牛棚里。那时，年幼的斯达特就孤苦伶仃地带着小妹妹，给封建主当奴隶。他们被奴役得不象人样，封建主竟叫他们“鬼人”。解放后，斯达特终于摆脱了封建主的奴役，参加了工作。党又送他到民族干部学校学习。在民主改革中，他毫不疲倦地工作，发动贫苦农民。改革结束，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积极地领导农民发展互助合作，带头进行耕作技术的改革。现在，斯达特已经被选为乡长，还两次被评选为全縣的先进工作者。斯达特回憶了自己的过去，对我说道：“我们藏族人民能有今天的幸福，全靠党和毛主席，全靠千百万象我父亲一样流血牺牲的烈士，我们要担负起他们没有完成的任务。不管有什么艰苦困难，我们一定要叫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，在我们手里实现！”

（原载1959年7月19日人民日报）

甘孜一村庄 遇之

这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縣西北角上的一个偏僻的地方。一条清流蜿蜒而过。两岸叢綠樹环绕着星散的村庄，在一座

座方形的藏式房屋中間，可以看到突出的經塔的圓形尖頂。五月，緊張的春播已經結束了，青青的麥苗像錦匹般復蓋着山野。穿紅戴綠的農業社社員，成群結隊地在地里除草，時而傳出陣陣歡笑或高亢的歌聲。這里的一切，充滿了歡樂和興旺的氣象。

扎科，是這一帶村莊總的名稱。民主改革前，這里的土地全部為封建主們——四大頭人和九個寺廟所占有。三百多戶農民被劃分為三種：差巴、科巴和娃子。“差巴”領種封建主一份土地，每年向封建主交納各種貢稅和支應數不清的差役；“科巴”領種一份土地後每年要以一半以上的時期為“主人”服勞役；“娃子”則全部喪失了自由，沒有家產，沒有土地，為農奴主牛馬般地服役。在那黑暗的日子里，扎科農民的絕大部分，勞動終年，收入只够吃幾個月，半年以上的歲月靠着乞討、借債和挖野菜吃來勉強度過。全鄉有70%以上的人欠債，有的經過了幾代還沒有還清。農奴們衣衫褴褛，几十年穿着一件爛羊皮或一件毪子衣服（用粗羊毛編織成的布做成的）；此外的生活所需，就更談不上了。儘管這樣，農奴們還常常受到封建主酷刑的殘害。過去的農奴、現在農業社社員扎西告訴我說，他親自看見和聽說的就有三個農奴由農奴主下令殺活活用刀砍死，有一個農奴因為背地說了幾句不滿農奴主的話，被挖穿上下唇用鎖把嘴鎖上；有兩個農奴臉上被烙印示眾，“罪名”是沒有按時交差，人們還向我描述了許多駭人聽聞的刑罰，如挖眼晴、剝皮、割耳、割鼻等等。

但是烏雲过去了，扎科人民通過民主改革得到了徹底解放。從前的農奴分到了土地、房屋、牲畜和耕牛，獲得了自由。

剛剛從封建農奴制下解放出來的農民遇到很多困難，糧食

不够，有三分之二的人面臨着斷炊的危險，生產需用的種籽、農具也很缺乏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人民政府向農民們發放了幾萬斤救濟糧和三十多頭耕牛，給一百多戶農民貸放了種籽。在工作組的領導下，全鄉農民組成了十八個互助組。絕大多數貧苦農民都參加了互助組。人們興高采烈地掀起了獲得解放以後的第一個生產高潮。當年就得到了大丰收。

兩年多來，扎科人民積極改進耕作技術。許多妨礙生產發展的陳規陋習，逐漸地被廢除了。過去不准修水利，說是破土要驚動“神”，不准進山挖藥和打獵，說是“神山”，婦女不准犁地，下種要打卦，“忌日”不准下地等等，現在已成了社員們的笑談。為了積肥，小伙子們組成了突擊隊爬上積雪的高山去造肥，老人和小孩也參加了揀糞。人們第一次用上了新式步犁，用播種器改撒播小麥為條播，實行選種、浸種等等。這些改進對促進藏族地區的生產發展有著很大的意義。

許多在民主改革中表現積極的農民被選為鄉、社干部，成了全鄉農民的社會主義带头人。在訪問期間，我發現這些昨天的農奴一個個精神飽滿，工作熱情。在鄉人民政府里，在田野上，經常都可以看到群眾找干部親切地交談，請求他們幫助解決各種問題。

扎科的鄉支部書記扎交向我介紹了這一切後，興奮地告訴我，民主改革後兩年來，扎科糧食產量有很大的增加，1957年比1956年增產20%，1958年又比1957年增產25%。扎科人民從切身體驗中看到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，1958年就建立了第一批農業生產合作社。今年春天，全鄉農民再次掀起入社熱潮，短短一個月中，報名入社的便達到了總戶數的80%以上，實現了合作化。

現在的扎科，家家充滿了歡樂。我曾經訪問過許多人，無

論在那裡，人們總是熱情地歌頌今天，異口同聲感謝黨和毛主席。

達雀的家庭就是一個例子。他的兩間房子打扫得干干淨淨，靠牆擺着幾個大木櫃和箱子。櫃子上擺着熱水瓶、茶碗和一些瓶瓶罐罐之類的東西。兩個藏式矮床上鋪着過去只有封建主才鋪得起的花羊毛藏毯。牆上到處都貼有從畫報剪下來的圖片，中間是一幅毛主席的像。在矮矮的茶桌前面，擦得亮堂堂的銅壺在茶爐上吱吱地叫着……

達雀很小就隨母親從別處流浪乞討到這裡，十歲給封建主看馬當雜工，後來和一個科巴的女兒結了婚，向頭人領種了三袋地（播三袋種子的地，一袋地約二畝多）當科巴，在過去的歲月里，他每年大部分的時間都去給領主種地、砍柴、放馬，农忙時只能半夜回家搶種自己的一點地。地少，庄稼又長不好，每年收的糧食吃四、五個月就沒有了。他向頭人借高利貸，春天借一袋秋天還一袋半。後來頭人怕他還不起，不多借，他就只好外出討飯。民主改革前，他的全部財產就只有他和他妻子每人一件老羊皮，每人一件千補萬縫的氆氌，一個泥火爐，一把泥茶壺和一個破櫃。

在民主改革中，他除了原種的土地屬於他以外，又分得了四袋地，十幾只羊和一些糧食、農具等。當年他就參加了互助組，1958年又加入了農業社。1957年收了二十多袋糧食，1958年收了三十多袋（每袋六、七十斤），這比他過去三年收入的總和還多。

我訪問扎科的時候正是春夏之交。他說，過去在這個時候，正是該出門要飯的時候了。他揭開衣服，我看到他的腿上到處都是狗咬的傷痕。而現在，他頓頓吃的是清香的糌粑，酥油和茶都不缺。1958年一年他就吃了十幾箇茶（藏民喝的磚茶）。

四塊為一餓，一餓約四斤）。另外他还养了两头牛和十几只羊。

他打开櫃子，拿出一件又一件的皮衣、棉衣給我看。过去，他从来未穿过布衣服。这两年，他和他的妻子、孩子每个人都添制了新衣。

被反动封建主夺去了丈夫生命的璠珠，現在和她三个孩子住的房子依山傍水，是个很美丽的所在。她家里鋪的、用的、穿的甚至还超过了达官。以前她家是一戶差巴，每年要定期向头人交納十几种貢稅，还要無休止地帶上自己的牛馬为头人支差；生活不下去就靠借債过活，到民主改革前已經負債一千多塊大洋。民主改革后她冲的地再也不支差了，还分了二十只羊，又和别人合伙分了一头牛，一家都入了农业社。她的大女兒在社里放牛，闲时和她一块上山挖药、砍柴，1958年家里付业收入就有三十多元，按照她的說法，真是“吃穿不愁從來沒有想到过的好日子。”

鄉長錯愛柱在送我回住所的路上告訴我說，現在扎科的农民已經人人吃得飽、穿得暖，大部分人有了新衣服，穿上了鞋子，每家有几头牛，在地里干活休息时吃得到酸奶子。另外，民主改革后，扎科还办了歷史上的第一所小学，有一百六十多个孩子上了学，平均每两戶就有一个孩子在念書。

扎科人民从切身生活中深深知道，誰是他們的救星，誰領導他們开辟了走向幸福的道路。許多人家都把毛主席的象挂在最尊貴、最醒目的地方。他們热烈响应党的每个号召。从1959年春天以來，这里的人就掀起了一个空前未有的生产高潮。差不多农业社計劃1959年粮食产量要在1958年基礎上翻一番，爭取每袋地收到六袋粮食。他們施肥量比1958年增加了一倍，并破天荒实行了合理密植、泥水选种、药剂拌种等新措施。过去这里

不种菜蔬，1959年，他們為迅速改变扎科面貌，決心發展多種經濟，大种白菜和蘿蔔，并且計劃要几十头猪。

扎科人民在短短的几年中經歷了一場天翻地覆的變化，他們正沿着幸福的大道向前飛速迈进。

掙脫枷鎖以後

里 深

——康定縣營官寨農業社訪問記

翻过披冰戴雪、云霧茫茫的折多山，就來到了由一百零七戶藏族農民組成的營官寨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。這裡，剛剛粉碎了农奴制度、掙脫了奴隸枷鎖的農民，正在共产黨的領導下，創造着新的生活。

民主改革以前，封建农奴制度就象一條毒蛇纏在這裡的藏族人民身上，吮吸着他們的血汗。這裡流傳的一首民歌，描述了过去的情景：

“我們的眼泪好比折多山上的雪水，
流呀，流呀，流不尽；
我們的痛苦好比折多山上的冰雪，
積呀，積呀，越積越多。”

这一百零七戶藏族農民中，過去有五十多戶人家四处流浪，乞討為生；其余的人雖然終年勞累，但也不得一飽，一年中有半年的日子靠野菜充飢。有不少人死于繁重的“烏拉”差役，有不少人在农奴主的酷刑下飽經磨折，死于非命。每一戶社員，在过去的年月里，都有着各種不同的悲慘遭遇，从肉体到心灵，农奴制度給他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創傷。有的被挖掉

了眼珠；有的被割断了舌头；有的被抽去足筋；有的被宰去了手指；有的妇女被农奴主强奸以后，安上偷盗等罪名，终身抬不起头；有的从小在农奴主家受尽折磨，弄得神经失常……。只要提起“过去”，人们总是禁不住泪水迸发，话话哽咽，农奴制度除了痛苦和饥饿，再没有给予藏族人民其他任何东西。

三年前，平地一声雷，这里的藏族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粉碎了农奴制度，受尽苦难的农奴站起来了，他们分得了土地、房屋和牛羊，摆脱了剥削和压迫。1958年，这里周围一、二十里的几个村寨，又联合起来建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。从此，他们永远结束了贫穷、痛苦的生活，向幸福的社会主义稳步前进！

痛苦的歌声再也听不到了，人们现在唱道：

“天空升起了五色的太阳，
折多山顶闪烁着美丽的金光，
清澈的雪水滋润着富饶的土地，
泪水汇成的泉源已经流得无影无踪，
雄鹰在翱翔，‘呷谢’（注）飘四方。”

（注）‘呷谢’意为欢乐的歌声。

在完成了民主改革、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段短短的时间里，生产上已经发生了驚人的变化。

1950年，社里耕地都是使用新式步犁，又深又平；播种全用马拉播种机，又干净又整齐；1958年秋收，还租用了附近国营农场的联合收割机，所有的青稞、小麦，在三天中就割完、风干、扬净、入仓了，而过去从收割到脱粒一直要拖半年才能完成。这些看来很平凡的事情，只要和过去一比较，立刻会使人感到万分惊讶、变化巨大：四、五年前，这里还保持着“刀耕火种”的状况，可是，曾几何时，就面貌一新了。

过去在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压迫下，广大藏族农民终年劳累，仍然免不了挨冻受饿，所以，人们对生产是不十分关心的。每年冰消雪化以后，马马虎虎地撒上种就不管了，到秋来收多少算多少。现在情况却完全不同了。副社长丹真志玛告诉我：“为了保证大丰收，1959年下种比往年提前了半月，每畝上了七、八千斤好肥，种籽都经过泥水浸选、农药搅拌，实行了合理密植，同时还种植了大量的高粱丰产试验田。”在田野里，我看見一队队的社员，一边唱着歌，一边在除草、追肥。密密层层的麦田，波浪翻滚，一眼望不到边，新修的渠道里清水盈盈，一直伸向远方，许多麦田、青稞田里插着写的亩产五百斤、千斤的指标牌。在折多山脚下，我遇見了青年突击队队长加玛，他带领着一、二十个青年社员正在山坡上积草木灰。这个小伙子把袍子的袖子脱下来拴在腰上，干的正起劲，不时还高唱几声藏戏。我走过去和他交谈了起来。加玛告诉我，现在全社正在开展积肥运动，争取每克地施足两万斤肥。全社还办了十座小型化肥厂，又造土化肥，又制土农药。我提起过去的情况，加玛伤心地说：“过去我们藏民种地不施肥，是因为丰收了反而会带来更大的灾难，会有更多的人上门逼债；反动喇嘛也到处捣鬼，故意坑害我们，散布各种邪说来欺骗人，无非是要窮人永世翻不了身。”现在，这里的藏民种庄稼不但要施大量的肥料，而且学会了各种田间管理技术。他们精心锄草，适时浇水，用喷雾器喷射农药防治病虫害，培土、松土、匀苗、防倒等等。过去“打卦”下种，用“神水”治虫，等等迷信习俗，已经成为笑谈资料了。

在过去的年代里，残酷的封建农奴制度加上原始的生产技术，使得这里的生产情况一直处于极其低下的水平，粮食产量每克地只有几十斤，有时连种籽也收不回来。自从完成民主改

革，踏上了社会主义大道以后，这里的生产就象一匹脱缰的野马，腾空而起，一日千里，直追先进民族。1959年，每克地的产量已经达到二百多斤，比民主改革前增加了三、四倍。藏族农民过去想也不敢想的，现在却变成了平常的事情了。

由于生产的高速度发展，这里的社员们已经开始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，贫穷和饥饿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近年来，差不多每一家都有余粮，都喂了肥猪、奶牛；半数以上的社员新修或培修了住房；无论哪一家社员都是每天三顿酥油糌粑，而且还有干羊肉、腊肉作添，有时还要吃吃烙面饼、煮面片、换换口味；人人添制了新衣、新帽、新靴。

女社员莫洛一家四口人最近搬进的新居，是一幢新盖好的藏式楼房，是她自己买好材料在农闲时候请社员们给她盖起来的。楼下拴了两头奶牛，又肥又壮；楼上三间屋子不大不小，屋内矮桌、垫子、小食櫃等家俱摆设得异常整齐，牆壁上挂了一幅崭新的毛主席像，象上挂着一条雪白的哈达。我到莫洛家的时候，这位六十来岁的老人，正带着孙儿在煮腊肉。她的女儿是妇女队长，出工去了。当我问起她家的生活情况时，莫洛滔滔不绝地告诉我：“1958年全家分了三千多斤粮食，喂了两头肥猪，两头奶牛，全家每人都缝了一件新的氆氇长衫，特地给女儿买了一条镶花围裙，因为她挣的工分最多。现在一个月吃的糌粑比过去一年吃的还要多得多。民主改革后就以为生活已经不错了，那知道越来越好……。”一谈到过去的日子，莫洛顿时眉头紧缩，沉思一阵，然后打开一个木箱，从里面取出一堆破布爛草，扔在地上，说：“这就是我们一家过去穿了十多年的衣服和用了十多年的被子。”天哪，这哪里是衣物，简直是一堆垃圾。可是，事实摆在眼前，千千万万农奴过去穿的就是这些。莫洛一家，过去是替封建农奴主种地的差巴，她

八歲那年，就離開了父母，開始上山放牛放羊，背水割草，擔負起了沉重的勞役，住在一間破爛不堪、透風漏雨的小屋子裏，過了幾十年半飢半飽的生活，除了沉重的勞役，便是皮鞭和辱罵，此外便再也得不到什麼了。莫洛說：“這幾年的變化太大了，真如從地獄到了天堂。要不是共產黨領導我們打垮了封建主，我們早已變成地獄里的餓鬼了，哪還有今天。”她還告訴我，村里許多人都日夜盼望能看看毛主席。她每天早晨端起一碗滾燙的酥油茶的時候，總要望著毛主席的像，心里有說不完的感激。

副社長丹真志瑪帶領我穿過長着茂密庄稼的田野，跨過碧流的溪流，訪問了許多社員家庭，家家過去都有一本血淚史，家家今天都有唱不完的幸福的歌。五十多歲的老社員羅桑多吉，是社里干活的一把好手，樣樣活活都一學就會，而且干的比誰都細致、在行。這位勤勞能干的農民，過去辛苦勞累三、四十年，連飽飯也沒有吃過一頓。每年秋收以後，打下的糧食全歸神封建主、高利貸主搶走了。他每年總有一半時間，靠一根竹釘棍和一個破碗，沿門乞討，從這個村莊走到那個村莊，從這個牧場走到那個牧場，馬欄牛舍、岩洞牆脚就是他的安身之所。他的全部財產只有三件東西：一支樹木柄、一口破鍋和一把銀勺。現在完全變樣了，我到他家的時候，正確上他在烙面餅，鍋盤里滿油茶熱氣騰騰，炭上鋪著花布的新被子疊得整齊齊，藏族農民的各種食物、用具應有盡有，大小鍋杓鑄了一長串，白瓷碗、茶葉、干肉、油餅等把一小木櫃塞得滿滿的。1958年，他還賣了一千三百斤余糧給國家，這位老社員生產越來越積極，每天不亮，他便起來出工了，一定要干好大一磚，才回家喝酥油茶，生產隊分配給他的任務，她總是超額提前完成。我和這位老社員擺談的時候，他一開口就說：“民主

改革、合作化，想不到让我老来走上了好运。”

在营官社訪問的日子，我还听到了許多有趣的戀愛故事。在过去，生活在农奴制度下的劳苦群众，連人身自由也沒有，哪里还談得上恋爱結婚等事情，許多人在沉重的劳役下疲于奔命，根本沒有結婚安家的可能，只有抱恨終身。只有农奴主和反动喇嘛們可以荒淫無恥、任所欲为。許多年青的姑娘，不是被他們霸占，就是被他們誣为“活鬼”，拖进寺庙，任其凌辱。現在，这一道鐵鎖已經完全粉碎了，全社有三十多个过去因各种原因不能結婚的人，都已經建立了幸福的家庭，享受到家庭的乐趣。喇嘛寺管家的娃子江澤西和差巴家的姑娘札喜，过去厂地里相愛了好几年，但由于旧制度的束縛，彼此都沒有人身自由，若要提起結婚，不但会遭到农奴主的反对，同时还会给自己帶來更多的苦难，他們不但不敢公开結婚，見了面連話也不敢說。一直到民主改革完成，建立了合作社以后，这对受尽折磨的情人才生活在一起，建立了自己的家庭。因為他們都很窮，結婚的时候一無所有，合作社便預支給他們部分粮食和现金，搬給他們一間新房，新房里各种傢俱十分齐全。結婚那天，社員們都去賀喜，喝了几壠青稞酒，热闹了一晚上，現存，札喜已經是社里的生产積極分子，江澤西担任了生产組長。社員彭錯和竹瑪，也是民主改革前就相愛了，由于农奴主的反对，他們曾經双双逃跑，但被农奴主抓了回來，痛打一顿，从此不准見面，他們不知流了多少眼泪，終于盼到了民主改革。現在，这一对青年男女早已結婚，1959年春天，竹瑪还生下了一个小女孩，取名“尼瑪”（太陽）。竹瑪說：“來了共产党，我們才算見到了太陽，有了幸福自由的生活，尼瑪将来一定比我們幸福几万倍。”

在訪問中，許多人都向我打听汉族地区建立人民公社的情